

考古还原：广富林人依水居，马桥人刻陶文

黄翔：现有发掘遗存表明，距今4000年上海历史发生变化，北来与南源文化注入

5月25日，文汇报讲堂169-2期《广富林文化中的北来与马桥文化中的南源》，由上海博物馆考古研究部主任黄翔作主讲，上海大学文化遗产与信息管理学院副教授曹峻担任对话嘉宾，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教授、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高蒙河作点评。

文汇报社、上海博物馆、上海市地

方志办公室联合主办，中国文物学会文化遗产传播专委会协办。上报集团技术运营中心融媒运营中心作技术支持，央视网、喜马拉雅、文汇报微信视频号作直播。

整理：李念 丁方健
摄影：周文强
版式：李洁

嘉宾主讲

距今4000年到3000年左右的这段时间，在经历了良渚文化的史前高峰后，上海历史在广富林文化时期进入低谷，并在马桥文化时期又开始向上攀援。但上海的历史从距今6000年至今连绵不绝。所谓的高峰和低谷只是现有考古内容发现的多少而已，并不代表“上海文化发达和不发达”。

依水而居的广富林文化

目前，可确认的广富林文化遗址均聚集在太湖周边地区，主要有西边的宜兴路墩墩、南边的湖州钱山漾、东边的上海广富林和北边的常熟北罗墩等。此外在杭州湾以南，宁波慈城小东门遗址也发现了广富林文化陶器。可见，目前广富林文化的分布范围较为有限。但广富林遗址的发现过程和广富林文化的命名颇有趣味。

它有没有继承良渚文化？

上一期讲座的考古文化终点落在良渚文化（距今5300年至4300年），这是2008年我在福泉山遗址墓葬中取出的良渚文化玉琮，可以肯定地说，它是良渚古城区域外发现的最精美的一件：神人、神兽、神鸟共出代表最高的等级。上海出土了众多良渚文化遗物，谁是这个发达的史前文化的后继者？对此，学界持续探讨多年。

1999年12月，领队宋建先生从广富林遗址的发掘中辨识出了广富林文化最典型的器物——侧装三角形足陶鼎。它与良渚文化的陶鼎风格截然不同，三角形鼎足上的肌肉状纹饰是其重要的特征之一，摸起来与小臂弯曲后突起的肌肉类似。

此前，广富林文化的陶器在发掘出土后一直被归入良渚文化中。宋建在2006年“环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末期文化暨广富林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正式提出“广富林文化”这一命名，并获得学术界的认同。

松江广富林遗址是目前发现广富林文化遗存最多的遗址，作为广富林遗址发掘执行领队，我从2008到2015年，全程参与广富林遗址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在大量负责绘图、记录和清理等工作的技工、普通工人与考古专

业人员通力合作下，我们在广富林遗址发掘中有哪些发现呢？

衣食：骨针缝衣服，鱼竿钓鱼，犁刀提高稻作

先民穿什么？像衣服这类有机质的材料很难保存，通常墓葬内只剩下人类骨骼。但在广富林文化遗存中发现了大量保存完整的骨针，通体细长，上面有一个针眼。由于尚未发现广富林文化衣服的残片，所以古人如何使用骨针缝制衣物还未可知。同时还发现古人用于束发的骨簪。

先民吃什么？中国人是最早栽培水稻的民族，广富林文化的石犁是古人农耕的实证。当时的石犁形体较大，长度可在50公分以上，在崧泽文化时期不超过20公分，刃角较大。良渚文化时期，犁体量变大甚至出现了组合式的石犁，但是单体体量没有广富林文化大。大体形石犁的出现代表犁效率提高。

半月形石刀是广富林文化的重要农业器具，用于剥取稻穗。一侧有两个穿孔，中间绑一根绳子，大拇指穿过绳子，手握半月形石刀背面使用，配合石镰收割，形成了这样一套农业方式。

此外，还发现了三角形的骨镞(zú)，比良渚文化的柳叶形镞更具杀伤力。

鱼钩的发现说明当时以食鹿、食猪为主，但也摄取水产。

住房：两开间、三开间和圆形房址和钵形釜

广富林遗址中发现了保存最完整的广富林文化时期的房址F12。该房屋为两开间，墙中间没有连通的门道，左、右各有30平、20平。通过房址的平面图能够清晰地看到基槽和柱洞。房址的南侧还有一个室外活动面。房屋为木骨泥墙结构，中间墙面较为光洁，木骨外的墙体也很平整。由于经过炙烤，整个墙体较为坚硬。这座房址被整体打包提取，目前在广富林考古遗址展示馆内展出。

2008年的发掘中发现了一座三开间的房子。最西边的房间南北两侧都有门道，北墙外堆积了一片密集的陶片，上面画着两圈，这是当时用于储藏的陶器，放置在北门屋檐下。房屋的基槽中保留了大量柱洞，木骨泥墙结构比F12更完整，房屋整体结构也较完整。

此外，还发现了一座圆形的房址，

其中同时出土了两件器物：大口瓮和钵形釜。这两件器物同时出土为钵形釜功能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线索。钵形釜盖在大口瓮上严丝合缝，形成了一个结构非常完整的重形，配合钵形釜的两个釜手，扣过来用，从力学上看更加合理。自此可以明确钵形釜其实是一个大器盖，解决了钵形釜的定性和定名的问题。

环境：湖边遗存发现湖中木桩，墓葬内有屈肢葬

考古工作者在广富林遗址最北侧发现了一处布满大量陶片堆积的遗存，通过土壤结构可以判断出这是一处位于湖边的遗存。

除陶片外，在该遗存中还发现了两排疑似树木的东西。在将周边的土挖掉后，露出了木桩顶部的部分，下面很多结构都有3米多长的木桩，由此推翻了先前认为可能是水生植物遗存的猜测。暴露在淤泥以上的部分腐蚀严重，但淤泥中的木桩保存得非常完好，原来这是距今4000年前人工打到湖底的木桩！

同时，考古工作者也发现了一些坍塌并深埋在淤泥中的横向木桩结构。在对所有木桩进行检测后，我们从木桩的布局上复原出两条延伸进湖里的平行线。这可能是深入湖中心的一个木栈桥。

广富林文化的墓葬目前只在上海松江广富林遗址有发现，其中只有M35有随葬品。并且还发现了一座屈肢葬的M40。与良渚文化墓葬排列有序且均为南北向的墓地布局不同，广富林文化墓葬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和传统，希望以后的考古工作者可以解开这个谜。

将这些要素整合复原可以看到：广富林人无论是房屋或墓地都依水而建，对水边的开发比以往我们发现的古人要用心得多。

留下陶文的马桥文化

马桥文化是上世纪80年代因上海闵行马桥遗址的发现而命名的考古学文化。马桥文化的工作比较充分，在整个环太湖地区发现了许多有马桥

文化遗存的遗址，数量比广富林文化多。它的典型器物之一是鸭形壶，看起来像一个挺着肚子的小鸭子，后面还翘着尾巴，口部呈敞口状。

上海虽然是马桥文化的命名地，但发现的马桥文化遗址并不多，考古发现也并不多。老一辈上海考古工作者用仅有的考古发现判断出它与其他考古学文化的区别，体现了他们的学术能力，也指导了后面学者们的研究。他们提出了“马桥文化”的命名，并得到了考古学界的认同。可以说，“马桥文化”是老一辈考古工作者留给我们的财富。

印纹硬陶是马桥文化最重要的发明。“陶质非常坚硬”是它的特征，在敲击时会产生与敲击瓷器类似的响声。装饰在器身上的印纹纹饰是通过拍印的方式制作而成，连续拍印就会形成连续的图案，由此产生印纹硬陶。

马桥文化陶文是十分有趣的一种现象。它们发现的位置非常单一，均出现在红褐色硬陶器物口沿上。通过观察发现，陶文很可能是古人用“指甲”刻画的。学者们将这些陶文进行了分类，尝试解读它的内涵。

一类主体为数字。可能与陶器制作工艺有关，也可能是制作工序、制作的数量还有器物的数量。另一类为组合式花纹，可能与制陶泥料来源、加工方式甚至陶窑类别有关。还有一类结构更加复杂的组合，学者们普遍认为可能代表陶器制作者或使用者的名字。我倾向于这种说法的理由是：通过便于观察的口沿部分刻上自己的名字，以区分邻里间的私有财产或标记器物的不同功能。

以上都是考古学者现有的解读，但只是一种尝试。随着未来发掘材料的增多，或许会为我们解答这个问题提供更多线索。

碎片到历史拼图间的讨论

考古学通常会用类型学进行类比，推测考古文化的来源。即找出器物的变化规律，再结合考古地层的判断，排列出器物从早到晚是如何变化和变化规律。

现场互动

不同器物可区分不同考古学文化和人群

航空工业石小雨：考古学文化独立命名时的依据？如何区分彼此交融和吸收的多个文化？

黄翔：一定的空间时间范围内特定器物的组合，叫做考古学文化，它代表不同的人群。火炬形把的陶豆、侧装三角足的陶鼎、拍印纹饰的陶鬲，还有在陶鼎上施加绳纹的传统，这些要素集合起来就是广富林文化的特征。

现在良渚文化中一类叫做鱼鳍形足鼎的器物也被区分了出来，定义为钱山漾文化（距今约4300-4100年）。从此前近1000年器物的完整演变序列看，T形足背后鼎足横截面的宽度有从大到小到从小到大的规律，发展到末期出现了鱼鳍形鼎足，鼎身呈现垂腹形的状态。钱山漾文化的陶鼎侧面看

广富林文化来自哪里？河南先民南下

基于类型学对陶豆、陶罐、陶鼎、陶鬲(guì)进行类比，我们推测广富林文化是龙山文化王油坊类型河南先民南下的结果。

以鼎为例，通过对比王油坊类型的鼎、南荡遗址的鼎以及广富林文化的鼎可以看到典型器物演变的线索。从这个线索反推，王油坊类型很有可能是广富林文化的来源。陶鬲也存在很大的相似性。

学者们据此提出了两条迁徙路线的初步判断，分别是：从河南到苏北，过兴化的南荡遗址再到上海；从河南到安徽尉迟寺、禹会到南京地区牛头岗最后到上海。

值得一提的是，在广富林文化的溯源过程中竖条纹陶杯是一件关键器物。由于它的出土，才指引我们找到了王油坊类型这一来源之一。可惜的是，后期的发掘中却没再出土类似的器物，让人不禁感叹考古的偶然性。

通过对比良渚文化陶鬲、山东龙山文化陶鬲，广富林文化陶鬲的口沿部分，可以看出广富林文化中有继承良渚文化因素的器物存在，也有与山东龙山文化相似的器物。说明广富林文化既继承了本地文化传统，也吸纳了来自北方的文化传统。

为进一步探寻广富林文化与良渚文化的关系，我们对广富林遗址发掘出土的玉琮进行了仔细的分析。广富林遗址出土的玉琮制作简单粗糙，虽然在造型上保持了内方外圆的结构，但完全不见良渚文化玉琮的神人神兽神鸟共出的精髓。通过这些观察，发现这些玉琮虽具有外形的要素，但其内涵已经消失了。

马桥文化来自哪里？浙南闽北等方向居多

马桥文化的器物类型很多，当分开进行梳理对比后可知马桥文化的来源是多元的。有良渚文化本地因素的传承，也有来自浙南闽北地区肩头弄

文化的影响，更有来自中原地区文化的延续。由此，我们将马桥文化定性为来自不同方向因素的集合体，经过融合在上海地区形成了马桥文化。

基于马桥文化所处的时期，我们不禁思考它是否对外也有影响呢？一件现藏于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的鸭形壶，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这件鸭形壶与上海出土的鸭形壶十分相像，到的是马桥文化传到中原去的，还是从中原传到马桥文化中来的？“从发现早的地方传向发现晚的地方”是基本的判断方式。但由于这两件器物年代相差不大，所以也无法判断。但是，从总体来看，马桥文化的器物在江南地区发现数量庞大，中原夏都发现得很少，哪里发现得多，可能也代表从哪里传出去的趋势。

历史的转折：距今4000至3000年的大势

良渚文化时期或良渚文化之前的文化脉络较为单一，呈现出非常线性的发展，文化要素贯通始终，只有一个主体。例如从崧泽文化到良渚文化炊器的演变过程中，器物形态几乎一致，仅在足上有所变化。崧泽文化时期为铲形足，良渚文化时期为T形足或翅形足，具有很强的文化传统。

但对比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的两件陶鼎，我们似乎就无法确定它们也是“一脉相承”。两件器物看似具有相同的文化因素，但其中一件为孤例，并不能作为有力的判断依据。不过，或许它会是找寻广富林文化和马桥文化关系的一个线头。如果将上海地区的史前史比作一根线，这根线在距今4000年左右断了，历史在这时发生了重大变革。

这些告诉我们，现有发现只是历史的一小碎片，现在考古研究的结论也是一个由一小个碎片得出来的阶段性结论，与真正的历史拼图完全一致吗？不是。考古工作者在不断发现碎片，把这些碎片拼合成更大的碎片，再把这个大碎片放到了上海的历史、中国的历史甚至整个人类的历史上它真正应该存在的位置，尽管找这个位置非常艰难，但这是考古工作的任务和使命。

目前上海考古重点在史前遗址和海上丝绸之路

（线上）上海博物馆志愿者张昱肇：马桥文化对应夏商时期，上海历史一直沉寂到周代的吴越诸侯国，目前这段空缺中何有新发现？

黄翔：目前上海考古工作有两个重点，一是以文明起源、国家形态为标准的史前考古，主要针对史前时期崧泽、良渚、广富林阶段；另一针对上海航运中心的特点，聚焦青龙镇为主的海上丝绸之路考古。您提及的商周阶段恰巧不是现在的工作重点，暂时未展开。



▲开讲前，讲堂提供了上博崧泽良渚展的图录供听友们载着手翻阅



▲讲到马桥典型器物鸭形壶等，听友纷纷拍照留存